

社科研究型读者情报检索的特征

(南京图书馆书目部) 王邦华

内 容 提 要

图书馆如何有效地为社科研究提供情报服务?

本文通过对社科研究活动特点和规律的考察,否定了图书馆应直接为研究者提供“核心情报”的流行观点,指出在社科研究过程中,理论思考指导着情报检索,情报检索贯穿着理论思考,二者互相交织、不可分割。因而自己动手检索情报是任何社科研究的重要特征。图书馆的任务在于创造各种条件让社科研究者自己能够,“快、准、精”地检索到他们所需的情报。

本文把社科情报检索活动分为随机性检索、采集式检索、开矿式检索、扫描式检索、批判性检索、实用性检索等六种类型。提出图书馆应根据不同类型的检索活动的要求,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适销对路”的服务。其中一次文献是一切情报的基础,二次文献是图书馆进行情报服务的最重要的方式。图书馆改革和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服务观点,研究新的服务方式,提高一次文献服务质量,建立健全二次文献检索系统。

当代社会,文献信息激增,这种情况在社科领域尤甚。面临信息社会的挑战,各种社科情报机构应运而生,且有迅速发展之势。于是,有人提出,图书馆必须顺应这一潮流,尽快实行向情报服务的转变,即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加工,把有价值的社科情报提取出来,传递到研究者手里,使他们免去大量的、繁琐的搜集信息之苦而直接进入研究过程。与此同时,对于传统的一次文献、二

次文献的服务工作,则视为“过时”,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轻视。有人甚至认为,若图书馆不实行这一变革,从而向“第三代图书馆”转变,其作用将被各种社科情报机构所代替,其前途将是暗淡的。

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即图书馆究竟如何有效地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情报服务?实行情报服务是否意味着可以轻视和否定文献服务?这是一个事关图书馆的改革方向和服务重点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先对社科情报服务的内涵作一番分析。社科研究工作取得情报的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赖图书馆情报人员进行“情报调研”,以三次文献的形式向他们提供现成的信息,这便是直接情报服务;另一类是社科人员自己动手从文献源中检索信息,但需要图书情报人员帮助他们提供情报线索,扫清外围障碍,把载有他们所需情报的文献及时地准确地传递到他们手里,这便是提供间接情报服务。那么,图书馆实行情报服务,应以那一种服务方式为主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弄清楚:社科研究者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情报服务?他们能否依据别人提供现存的情报直接进入研究过程,而免去自己动手搜集信息这道工序。笔者通过对社科研究活动的考察得出的看法是,社科研究者所需要的情报是不能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图书馆或其它情报机构的检索来满足的,自己动手检索情报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理由如下:

其一,这是情报检索的目的性所决定的。茫茫书海无边无涯,研究者的信条是:

“任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可是这“一瓢”取于何处，如何取法，却不是随意的，而是服从于，服务于研究者特定时期所要解决的特定任务的。任何研究者所检索的特定情报，总是跟他的研究专题相关度高的情报，其余的则毫不可惜地舍去。正因为如此，不同的研究者，从他们各自的认识目标出发，面对相同的资料也会吸取不同的信息。读《红楼梦》的很多，有人注意的是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历史状况，有人偏重于爱情的探讨，最近，某矿办公室的一名干部却把王熙凤的管理术这一信息提取出来用于企业改革，建立起“纵横连锁，控制保证，层层分解，落实到人”的全面经济责任制体系模型。他的论文在国务院举办的“全国经济责任制研究班”宣读之后，震惊四座，被誉为“价值连城的企业赚钱经”，所以，研究者所需要的信息，首先是与他们各自的研究目的相关度高的信息，而相关度的高低，只有研究者本人在研究过程中才能界定，他人是难以代劳的。

其二，这是由情报价值的相对性决定的。某一情报价值的大小，不仅取决于该情报本身的内容，而且取决于检索者对其内容的理解和运用。传说美国某鞋厂派两名推销人员到非洲开辟市场，其中一人发回的电报是：此地人不穿鞋，对鞋的需求量等于零；另一人发回的电报相反：此地人不穿鞋，可以从零起步，前途无量！你看同样一则情报，对于不同的运用者，竟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在社科研究中也常有这种情况：同样一条情报，在平庸之辈看来其有用度等于零，从而演出了“买椟还珠”的笑剧，而在独具慧眼者看来，却是稀世珍宝，从而导致重大的发现。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专业研究者，善于从普通人认为不相关的知识间发现联系，从而产生联想爆发思想的火花，所谓“夕阳芳草寻常物，能用都化绝妙词”。著名史学家周绍良先生说：“我

只搜集我感兴趣的，将来可能有用而别人往往忽视的，例如：一些特殊的材料、特殊的解释、特定的说法。”所谓“对我有用而别人忽视”的东西正是情报检索和运用中的主体性差别。这种差别根源于研究者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研究能力、不同的价值标准，并且最终导致不同的研究成果。显然图书馆的情报服务是难以兼顾到这种主体性的深刻差异的。因而千篇一律的情报服务是难以满足研究者的不同需要的。

其三，这是由情报内容的真实性所决定的。真实是情报的生命，也是科学的生命。但是社会科学总是密切联系着人们的现实利益，社科信息的加工、传递又总是通过处于复杂的利害关系中的人来进行的，处于信道各个环节上的人传递什么信息，截流什么信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他所处环境中的利害关系的制约，因而，信息在加工传递中是很容易失真的。正因为如此，社科研究者一般不满足于经过辗转加工而提取的信息，而是力求搜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以期发挥厘正事实、考真辨伪、存真求实的功能，这是社会科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的基本要求。马克思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他为弄清一个材料或一个论点的原始出处，从来不怕任何“细小工作”和任何吃力的“技术工作”，他所引证的每一个材料或数字，都要得到最有权威的权威人士的证实，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是找原著寻根究底，即使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他的一丝不苟，使反对他的人，也从来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社科研究中这种对“第一手材料”的要求，靠情报机构提供的间接资料当然是不能满足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社科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情报检索活动总是跟他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当代科学哲学有一个著名的论点：科学始于问题，即科学研究活动是从提出问题那个时

候开始的。而为了能够提出问题,特别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研究者就必须从搜集资料、检索情报入手,通过对有关资料、情报的比较、分析,从而发现新的问题。我们通常说的资料准备阶段,决不是蚂蚁式的堆积资料,而是贯穿着研究者呕心沥血的思考。许多研究者都有这样的体会:从研究材料中发现问题的阶段,乃是研究过程中最艰苦、最重要的阶段、谁也不能越过这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研究过程的。而问题一旦提出之后,为了解决问题又要进一步去检索、研究新的情报,作出合乎实际的抽象和概括,由此可见在社科研究中,对情报的检索与对情报的思考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研究者总是边思考、边检索、边创造的,马克思在检索情报、整理资料时,不但根据研究的需要按专题进行分类,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而且常把自己随时迸发出来的思想记录下来,并标上记号,所以,经过他搜集和整理的资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料,而是他初步的研究成果了,如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便是。了解到社科研究的这一特点,就不难懂得:社科研究者对情报的检索和整理是不能由别人代劳的,谁如果能代替他们检索和整理,就无异于能代替他们思考和研究了。

在图书馆改革的探索中,我们了解到有些单位为了把图书馆办成社科情报中心,在一些专业学术领域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研究,但效果大都很不理想。他们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专业情报分析和研究,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专业研究人员又觉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他们常常把这些情报分析置于一旁,自己动手从头做资料工作,这倒不完全是因为这些情报分析水平低,质量差,而是科研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决定了研究者不能仅仅依靠别人提供的现成情报去进行科学概括。这就从反面提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最需要的不是直接情报服务、而是间接情报服务。因而我们图书馆不要提供客观

上不需要的服务,不要干那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应当把眼光放在提供切切实实的间接情报服务上。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必要对社科研究中的情报检索类型作一个大致的考察,看看这些不同类型的情报检索活动要求我们提供哪些服务,以及我们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服务。

笔者把社科情报检索活动粗略地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一) 随机检索型。鲁迅在谈到读书方法时,曾经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他把这种方法叫作“随便翻翻”。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社科领域的学者,当手头没有专题需要研究时,也并未停止资料搜集工作,这种搜集资料的方式便是“随便翻翻”,带有随机检索的性质。在随便翻翻的过程中,一方面积累了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有价值的课题,这时,随机检索就化为有目的的检索了。正如鲁迅所说:“先行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一门或几门。”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原来是学习型的读者,并不是出于研究的目的,而是出于求知的愿望来翻阅图书资料的,可是在“随便翻翻”之中,不期而然的受了某本书、某种观点、某个故事、某种方法的启迪,犹如一粒种子播进了他们的心灵,终于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萌发为科苑中的奇花异卉。我馆读者南京军区司令部宣传干事张维平就是一例,他原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他从“文化的荒漠”来到“书的海洋”,简直不知道如何读这许多书,开始也只是“随便翻翻”。可就在这过程中,他从名人读书的方法中受到启发,萌发了写书的念头,开始有目的地搜集资料,从学习型转变为研究型,终于写出了《读书的艺术》、《名人读书百法》等五本青年读物。对于这两种随机检索的读者,我以为最有效的服务就是顺其自然,为他们的“随便翻翻”提供最大的方便,诸如

开架阅览、推荐新书好书等等。

(二) 采集式检索。赵翼曾自道其《廿二史劄记》成书过程云:“每一题目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我国古代学者王充喜欢读书学习,家里窗台、书架、壁洞都放着笔砚简牍,看到有价值的资料,就先抄录下来,而后深入思考,积之几十年写成了一部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的巨著《论衡》。这种按一定的专题研究需要,从大量的、分散的文献中采集信息的方法,称之为“采集式检索”。其基本特点是:有一个明确的专题,并根据专题划出一个适当的检索范围,不可过泛,更切忌太窄。如鲁迅所说:“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在这种采花成蜜的过程中,研究者常常遇到的困难是:有了明确的专题,却不了解检索的范围和书目,或者只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所以研究者在运用采集式检索方法的时候,最关心的就是书目,并且还常常自己动手制定专题书目。例如列宁一向十分关心各种书目,无论是图书馆的卡片目录还是数量浩大的出版目录他都看,还根据图书馆目录资料编制了多种参考书书目。如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刊载了大量参考书书目和摘自瑞士各地图书馆的图书目录札记和摘录。他在给亲友的许多信中也常常提出给他寄图书馆目录和书店目录的要求。这一切使他“善于在每一个特定的时刻从现有的浩瀚的书籍中选出自己阅读的书”,为他的理论采集各种必要的信息。此外,我们从许多著名学者的治学经验中也可看出书目对他们研究工作的重要。为了适应这类读者博采众长而创新的要求,精心编制各种图书目录、专题书目、题录索引等检索工具,是图书馆一项永久性的服务内容。

(三) 开矿式检索。我国著名学者蔡尚思搜求《中国思想史》资料时,广泛涉猎,

亲自翻检,前后历时十余年,遍搜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图书馆,读书破万卷以上,遇有所取则随时抄出。他把这种检索方法称之为“开矿式的搜集法”,有如古人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蔡老在《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中,这样谈到他的“开矿”经验:“我们知道开矿山的人事先只能大概地知道某一带区域有金矿,于是不管矿多矿少有矿无矿,都是一样的拚命一重一重地往里面掘,结果愈掘愈深,越开越广,一切金矿都跳不出他的手,费心力虽多而所得金矿也不少。又如淘金砂者和掘地下古物者和开矿方式与情形相同,而我们治学者对于书本上的材料其搜集方法亦何独不然!”笔者理解,“开矿式检索”,多用于开拓型研究,服务于鸿篇巨制的创造。研究者从何处寻找资料,起初他们本人亦不甚了了,他们更无法提供具体书目,只能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象开矿那样一尺一尺地发掘。由于社科领域的知识单元呈网络状、组织较为松散,决定其检索特点是量大、范围广,常常一取就是几百本,且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对于这样的研究者,最有效的服务方法是特许他们进库选书,或者为他们开辟专科研究室。五十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柳诒征馆长特许蔡尚思住馆读书年余,摘抄了几百万字的资料,为他毕业的研究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蔡老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大图书馆真可叫做‘太上研究院’!”另据唐珪璋教授回忆,解放初期他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古籍部查资料,编著《宋词四考》,当时李仲融馆长也曾特许他进库找书,大大加快了成书时间。去年,南京金陵图书馆成立了“读者协会”,确立了一批重点读者,请他们进库选书,以促进、催发早出研究成果,我以为这是值得推广的做法。为什么不多办一些这样的“太上研究院”,让更多一些的重点读者跟我们一道来开发图书馆这座金矿呢?这犹如让鱼儿遨游在海洋里,让蜜蜂飞回到

花丛中。

(四) 扫描式检索。在着手研究一个专题之前,研究者首先要把这个专题的有关背景材料作一番大面积的“扫描”。然而这种“扫描”很重要,否则就会重复别人的劳动。俄国有个偏僻小城的中学教师齐奥尔科夫斯基,由于得不到资料,无法进行“扫描”,毕生创造大都重复前人的发现。在这方面,图书馆可以提供综述性的、动态性的专题情报分析;在这方面,三次情报服务是有一定作用的。

(五) 批判性检索。其目的是搜集反面材料、错误理论、以开展批判性研究,或者用作比较和鉴别。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所进行的极为浩繁的资料工作中,有相当大的一部份是批判性检索。列宁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私人藏书中,专门设立了一个“自卫书架”,把新从国外收到的出版物以及私人出版社出版的东西都放到这个书架上,当时私人出版社往往出版一些思想敌对的,理论上站不住脚的书籍,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列宁仍然十分关心对方那个营垒写了什么。鲁迅也曾主张适当看一些反面作品,用作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在社科研究中,批判性检索永远是必要的,它要求反面情报的真实性、完整性、原始性,切忌断章取义,歪曲原义,尽可能地查阅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我们图书馆在这方面要开明些,开放些,为这些读者尽可能提供原始的反面资料。

(六) 实用性检索。研究某个专题的过程中。大局已经谋定,整体已告成功,尚缺一些个别的具体的数据、事例或其它一砖一瓦式的材料。这样一些实用性的检索,也常常要花费大量的劳动,有时简直如大海捞针一样。对这一类的情报需求,图书馆除了可以提供必要的检索工具外,应尽可能的把文献加工成能为他们直接吸收采用的知识单元,使他们得以避免大海捞针之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四点结论:

1. 尽管这些检索类型各具特色,但情报服务的基本要求无非是这样三点:一是为读者提供他所需要的情报线索,二是为读者找到载有他所需情报的原始资料,三是及时地把这样的文献资料传递到读者手中。这也是间接情报服务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正如美籍华裔图书情报学家教授刘钦智所说:

“对读者来说,不管是用传统的方式给他们提供资料,还是新的方式给他们提供资料,都是无所谓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读者利用这些资料,他们唯一注重的是,他们所需的资料拿的快,拿的准,又拿的好,他们满意就行。”

2. 在社科研究中不但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课题,常常使用不同的检索方法;而且同一研究者,同一研究课题的不同研究阶段,也会交替使用或综合使用不同的检索方法,因而对情报服务也就相应提出不同的要求。为了有效地为科研提供情报服务,图书馆应努力以不同方式满足研究者不同的要求,我赞成这样的提法:“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服务,而不赞成片面强调一种服务方式、轻视和否定其它服务方式的简单划一的做法。

3. 服务是图书馆的生命。在“多层次、多渠道、多功能”的服务体系中,一次文献是一切情报服务的基础,二次文献是图书馆进行社科情报服务最重要最基本的方式。通报性的书目是传递最新信息的初级情报载体;专题书目索引、专题文摘集,是图书馆开展情报服务的有效形式;而定题、定向的为重点读者展开特殊服务,开辟专题研究室实行一次文献的形式二次文献效应的综合服务;则是时代发展向我们提出的新要求。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有针对性的服务,为了把研究者们所需文献资料及时送到他们手里。当然,服务也需研究,但那是研究如

(下转第51页)

[illegible]

上述四方面的问题是文献著录和编制《著者目录标准文档》中经常遇到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尽早作出比较科学，比较合理，使用方便的明确规定，以便工作中有章可循，消除目前存在的混乱、无所适从和不统一状况。

图书馆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笔者认为,直接情报在社科研究的扫描检索等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它不能成为社科研究工作的基础,不能代替社科研究者自己的情报工作,因而它在社科研究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从属的,用直接情报服务的作用否定间接情报服务的作用是片面的,脱离实际的,也是违反科研活动规律的。当然,这里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社科研究的范围内。

• * • • * • • * •

表管理、建库检索、编辑排版等多功能一体化的自动处理。系统的自动抽词和标引部分综合了汉语特点和文献标引工作规则,在规则和词典结合方面有创新,其设计思想、抽词正确性、处理效果等方面均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系统使用的主题词典规模及停用词表的构成和规模都优于国内同类系统。此外,系统对推广应用的需要也作了较为充分的考虑,提供了较好的用户界面,在微机主流型号 IBM/XT 上实现,易于在国产长城 0520 及其他 IBM 兼容机上直接推广应用。该系统对汉语科技文献自动化处理作了富有开拓性的成功探索,对我国“七五”期间列为重点的中文文献数据库的文献处理自动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51